



Title	敦煌大族與前涼王國
Author(s)	馮, 培紅
Citation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 2009, 24, p. 93-129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18310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敦煌大族與前涼王國

馮 培 紅

1. 前言

在漢宋之間的敦煌綠洲上，世家大族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這些大族主要是從漢武帝開發河西之後逐漸形成的。2005年筆者曾撰「漢晉敦煌大族略論」一文，考察了此一階段敦煌大族的入徙、形成、發展及其特點。⁽¹⁾到西晉時，以索·張·氾三氏構成的“敦煌五龍”為標誌的敦煌大族已經成為海內高門。⁽²⁾然而西晉短祚，南匈奴劉聰於311·316年相繼攻陷晉都洛陽·長安，許多出仕晉廷的敦煌大族被迫退出中原，回歸河西，效力於被稱為“五涼”的河西王國。在中國傳統的二十五史中，列諸史傳的敦煌人物絕大多數生活在西晉·五涼時期。張澍輯『續敦煌實錄』所列從漢至五代共141位敦煌人物，大多也屬於晉涼之際。由此可見，西晉·五涼是敦煌人物輩出，羣星璀璨的歷史階段，在敦煌·河西乃至全國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五涼政權中，由漢族張軌建立的前涼王國（301-376年）割據時間最長，達76年之久，這與以敦煌大族為核心的河隴大族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學術界對五涼史的研究，頗多關注於此一時期的河西大族，尤其是敦煌

(1) 馮培紅 2005。

(2) 在傳世史籍與敦煌文獻中，五龍中有一人的名字記載有異，見『晉書』卷60「索靖傳」(p. 1648)載其與“鄉人氾衷·張肅·索紇·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而敦煌文獻P. 2625「敦煌名族志」則云：“族父靖，字幼〔安，與〕鄉人張肅·索紇·氾衷·索縚等五人俱遊太學，號稱‘敦煌五龍’”，『法藏敦煌』16, p. 331.

(3) 前涼王國的存在時間，若從301年張軌刺涼算起，至376年亡於前秦，共76年；若從323年前趙拜張茂為涼王算起，則有53年。茲取前者，並參『晉書』卷86「張軌傳」：“自軌為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p. 2252；前田 1967, p. 26.

(4) 後藤 1967「二河西王國と漢人名族」, pp. 30-33；白須 1980「(六)河西王國と名族社會」, pp. 34-40；武守志 1985；趙向羣 1989。

大族，可謂獨樹一幟，成為諸涼王國的重要支柱。⁽⁵⁾就前涼王國而言，1967年後藤勝指出，張軌的四大股肱謀主宋配·陰充·氾瑗·陰澹都出自於敦煌的名族，並推斷“對於前涼的創業，敦煌名族的支持是極為重要的力量”，另外他還提到了涼州大姓賈摹，出身不明的馬氏，以及敦煌大姓張·索·令狐三氏和西平大姓田氏；⁽⁶⁾1980年佐藤智水在後藤氏的基礎上亦云：“前涼一直被認為是由涼州的漢人豪族，尤其是敦煌豪族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⁷⁾1981年齊陳駿在說明張軌“聯合河西大族的力量，用以穩固自己的統治”時，列舉了敦煌宋·陰·氾·索·令狐·張氏及隴西辛氏·晉昌張氏·武威賈氏等河隴大族；⁽⁸⁾1992年洪濤也舉出敦煌宋·陰·氾·索·李·曹·張·閻·令狐氏及酒泉馬氏·晉昌張氏·武威賈氏，⁽⁹⁾足見敦煌大族對於前涼王國來說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不過，除了佐藤氏對張越之亂爆發時的兩派勢力作過細緻分析之外，學術界對前涼敦煌大族的敘述總體上顯得很籠統，如對史載所有前涼人物及敦煌人所佔比例缺乏統計分析，對張軌股肱謀主中二陰的郡望多未認真考辨，也未能深入考析敦煌大族與前涼張氏的政爭關係，甚至忽略了前涼張氏幾乎不與

(5) 『魏書』卷 52 (pp. 1145-1166) 將北涼遷代的河隴諸儒共 12 人輯為一卷，其中敦煌學者 5 人，佔一半弱。另外，不是傳主卻留有名字的還有敦煌氾潛·胡叟元妻宋氏·段暉女婿張氏·陰興等。這僅僅是五涼後期的河隴及敦煌人物，整個五涼時期的情形可參崔鴻『十六國春秋』，其中敦煌人也佔據了極高的比例。

(6) 後藤 1967, p. 31.

(7) 佐藤 1980, pp. 50-51.

(8) 齊陳駿 1981, pp. 65-66；後來，他對此續有論述，在舊說的基礎上又增添了曹氏·李氏二姓，見齊陳駿 2005, pp. 96-98。不過，他將曹氏的郡望似定為隴西，然未說明依據。

(9) 洪濤 1992, pp. 20-21。但他說前涼時李·閻為敦煌著姓，以及馬氏為酒泉大族，也未說明根據。

(10) 一派是以晉昌（敦煌）張越為首，聯合武威賈龜·金城（西平）麴晁與麴佩·京兆杜耽及出自不明的曹祐所形成的反張軌勢力中心；另一派是支持張軌的股肱謀主宋配·氾瑗·陰充·陰澹及王融·孟暢·張珙·令狐亞·尹員·王豐·田迴等人，也以敦煌大族為中心，但與前者相比，是稍次一等的豪族。參佐藤 1980, p. 51。按曹祐，據『御覽』卷 366「人事部七·耳」(pp. 1683-1684) 引王隱『晉書』曰：“張軌為涼州刺史，敦煌曹祐上言軌老病，更請刺史”。關於敦煌曹氏，可參馮培紅 2001，不過筆者當時尚未見到上條材料，僅揭出「唐故隋酒城府鷹揚曹君及琅耶郡君安氏墓誌並序」（參『墓誌彙編』, pp. 135-136）“君諱諒，字叔子，濟陰定陶人，晉西平太守曹祐之後也”之史料，對曹祐的郡望未作判斷。

敦煌大族相通婚這一事實。很顯然，敦煌大族既對前涼政權的創建卓有貢獻，同時也是前涼王國內部最主要的挑戰者，這些都需要進行具體的分析。

2. 前涼王國的社會基礎分析

為了徹底弄清敦煌大族在前涼王國中所處的地位，筆者曾根據傳世史籍與考古資料，將所能見到的前涼人物編為一表，共 398 人，102 姓，力圖盡可能全面地清楚展現前涼王國的社會基礎。其中，敦煌有 97 人，30 姓，各佔 24% 和 29%，這一比例雖然出自於不完全統計，但充分顯示了敦煌人在前涼王國中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¹¹⁾ 然此表篇幅過長，不宜在本文中逐一列出，祇好另撰它文。今將這些人物中姓名之前冠有地區者製作一張簡表如下（見次頁）：

首先需要說明一點，表中敦煌・建康・高昌・樓蘭四地的統計資料，尤其是後三地，大多來自於考古出土的墓葬・簡牘・文書等資料，有些姓氏之前所冠的地名並非指其郡望，而可能是由於任官・戍守・避難・經商・傳教等原因從別處來到該地的，流動性比較強；所列敦煌 30 姓中，前 17 姓主要見於傳世史籍，後 13 姓則僅出自考古資料。

從下頁簡表可以看出：

第一，儘管西晉末永嘉之亂流寓河隴的中原人士數量不少，但下表說明前涼王國的社會基礎主要仍以河西・隴右・關中的姓氏構成，而以前兩者為主，體現了前涼王國是以河隴大族為主體建立的地方性割據政權。⁽¹²⁾

第二，在河隴大族中，以敦煌大族最為居多，至少有 29 姓；其次為西平・京兆・武威・隴西諸氏，各佔四五姓，亦極有勢力。這一統計結果與上揭後藤・佐藤・齊・洪等氏的觀點大致融合。建康・高昌・樓蘭雖然所出姓氏較多，但這是因為出土資料的性質所致，且大多為流動性的人口或小姓。

(11) 馮培紅「『前涼人物表』及其反映的前涼王國社會基礎」，待刊。

(12) 『晉書』卷 86 「張軌傳」云：“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p. 2225；卷 14 「地理志上」云：“張軌為涼州刺史，鎮武威，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p. 434。

地區*	姓數	姓氏	人數	備注
安定	2	張・梁	25	
敦煌	30	張・宋・氾・索・令狐・陰・曹・謝・車・耿・劉・郭・侯・常・陳・單・童・李・趙・蘇・傅・韓・呂・吳・魏・徐・姬・頓・蓋・閻	97	
晉昌	2	張・唐	4	晉昌原屬敦煌
酒泉	2	祈・趙	2	
建康	12	賈・孫・梁・孟・耿・董・徐・湖・顏・周・當・白	18	
張掖	1	王	1	
西海	1	趙	1	
武威	4	賈・陰・段・姬	7	
武興	1	蘇	1	
高昌	9	隗・楊・宋・王・朱・孫・李・樞・韓	10	
樓蘭	10	唐・王・趙・關・李・嚴・苻・君・韋	19	
西平	5	麴・田・衛・王・郭	7	
金城	1	趙	1	
隴西	4	辛・李・彭・賈	10	
臨洮	2	翟・石	2	
略陽	2	郭・王	2	
京兆	5	劉・趙・閻・杜・宋	6	
武陵	1	閻	1	武陵一作武威
中山	1	王	1	
太原	1	王	1	
丹陽	1	唐	1	
龜茲	1	帛	1	
月氏	1	支	1	
合計	99		219	

* 這裏所說的“地區”，包括郡望・里貫・國籍。

第三，敦煌・武威・西平三地大族的動向最堪注意，他們雖然都對前涼王國給予了有力的政治支持，但敦煌張氏・武威賈氏與西平諸氏卻也都與前涼國主安定張氏展開了爭奪河隴統治權的鬥爭。

第四，前涼王國是個典型的大族社會，除了上表所列諸姓外，在沒有標明地望的姓氏中，孟・宗・胡・皇甫・尹・牛・馬・竇等氏亦為河隴・關中的著姓，但其他紀・綸・黃・嚴等姓氏卻多屬小姓，他們中的一些人雖也昇任到了長史・司馬・太守・縣令等要職，但大多數卻地位較低，如寵臣・親信・使者・牙門・市長等，以往的研究對這些小姓全無關注。

第五，毫無疑問，由漢人張軌創建的前涼王國的政權基礎主要是漢族，但也不可忽視境內存在著許多少數民族，如張軌勤王時發佈的一道檄文中說：“武威太守張珙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於臨晉”，⁽¹³⁾可見前涼軍隊中少數民族騎兵的數量非少，這些少數民族包括本地區傳統以來的氐・羌・小月氏等族，來自漠北地區的鮮卑・丁零等族，以及來自西域地區的龜茲・大月氏・粟特人。⁽¹⁴⁾

3. 張軌的四大股肱謀主——兼說前涼初期與敦煌大族的關係

『晉書』卷 86「張軌傳」云：“永寧（301-302）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為股肱謀主”。張軌是安定烏氏人，“家世孝廉，以儒學顯”，出自隴右大族。他來到涼州後，如何與河西大族相處並得到他們的支持，是擺在面前的頭等大事。傳文中的四大股肱謀主，在屠喬孫・項琳輯錄的崔鴻『十六國春秋』中，宋配・氾瑗・陰澹三人有專錄，皆標明為敦煌人，⁽¹⁵⁾然未載陰充。學術界大多籠統地認為這四大股肱謀主都出自敦煌大族，這一觀點是頗可商榷的。⁽¹⁶⁾

(13) 『晉書』卷 86「張軌傳」, p. 2225.

(14) 1907 年 M. A. STEIN 在敦煌以西長城烽燧遺址發現了著名的粟特文信劄，其年代據 W. B. HENNING 考證為 312-313 年之間，表明張軌統治涼州末年河西走廊有許多粟特商人，參 HENNING 1948 及其他學者的相關論文。

(15) 『屠項春秋』卷 75「前涼錄六」, pp. 926-927, 932.

(16) 除了前面提到的後藤・佐藤・齊・洪四氏之外，還可參李聚寶 1987, p. 80；趙向羣 1996, p. 43；馮培紅 2005 (p. 101) 也會受到這一觀點的影響，應作批判。

⁽¹⁷⁾ 宋配為敦煌人，見於『魏書』卷 52 「宋繇傳」：“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姓纂』卷 8 “宋”條有敦煌望，位列第二：“漢有宋諒，諒裔孫後漢（魏）清水公繇”，宋諒當即漢桓帝時出任敦煌太守的宋亮。⁽¹⁸⁾ 在敦煌漢簡中，也出現了候史宋賀·宋君長及宋望等人。⁽¹⁹⁾ 到西晉初，敦煌郡功曹宋質廢梁澄，扶立本地大族令狐豐為敦煌太守，東拒涼州刺史楊欣，足以顯示宋氏家族的實力。⁽²⁰⁾ 前涼時，宋配出任司馬·前鋒督護·西平太守等職，率軍討平鮮卑及曹祐等的叛亂，又東向勤王，為前涼王國的開創與穩固作出了貢獻。

氾瑗為敦煌人，可見於敦煌文獻 S. 1889 「敦煌氾氏家傳並序」，它記錄了西漢至前涼間的敦煌氾氏人物凡 12 位，最後一位即為 “氾瑗，字彥玉，晉永平令宗之孫也。……瑗少剛果，有壯節，州辟主簿·治中·別駕從事，舉秀才。三王興義，惠帝復祚，相國齊王國（閼）專權失和，瑗切諫不從，自詭為護羌長史來西。涼武王軌與語，不覺膝之前席。瑗出，王謂左右曰：‘此真將相才！吾當與共濟世難’。遂周旋帷帳，公幹心膂（後缺）”。⁽²¹⁾ 張軌出任涼州刺史·護羌校尉時，氾瑗假稱為護羌長史，回到河西；官任中督護，兵不血刃地討降了東羌校尉韓稚，穩定了前涼的東部邊境。

至於二陰的郡望，則較為複雜。目前所見，最早是明人屠·項輯『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六」記載陰澹為敦煌人：

(17) 『御覽』卷 378 「人事部十九·短中國人」引崔鴻『前涼錄』作“宗醜”，p. 1744.

(18) 『後漢書』卷 88 「西域傳」，pp. 2916, 2931.

(19) 『敦煌漢簡』No. 339, 362, 321，上冊，圖版叁柒，叁玖，叁伍；下冊，釋文，pp. 232, 233.

(20) 『通鑑』卷 79 晉武帝泰始八年（272）條，p. 2523。孫曉林 1996 在研究敦煌令狐氏家族時，曾對晉初敦煌宋氏的豪族性格亦有揭示：“從『通鑑』的記述來看，此事件似乎始終由功曹宋質操縱，身為郡府上佐的宋質敢於抗命涼州刺史，自行廢立，恐怕並非來自於功曹的權勢，而當從宋氏的豪族地位上得到解釋”；“在宋氏·令狐氏合作的這次事件中，我們還看到，宋氏和令狐氏的作用·角色並不一樣，廢梁澄·表立令狐豐，直至擊敗楊欣都是宋質所為，說明宋氏具備一定的武力，在他身上地方豪族的色彩似乎更多一些”，p. 95.

(21) 『英藏敦煌』3, pp. 168-169。關於這件家傳的研究，參池田 1962；王仲犖 2007；郭鋒 1995, pp. 36-37.

陰澹，敦煌人。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為治中從事。澹割身訴枉，軌任為股肱，參與機密，轉督護參軍·武威太守。軌保涼州，澹之力居多。⁽²²⁾……及駿嗣位，澹弟鑾為鎮軍將軍。駿以陰氏門宗強盛而功多也，遂忌害之。乃諷其主簿魏纂誣鑾謀反，逼令自殺，於是大失人情。

然該書未言及陰充，在「北涼錄四」中還有敦煌人陰興。⁽²³⁾之後，清人張澍輯『續敦煌實錄』沿承其說，將陰澹·陰興列籍敦煌，並續補了陰鑾，亦無陰充。⁽²⁴⁾近代以來的敦煌地方志大多相襲此說，甚至在『敦煌學大辭典』中也依然如此。⁽²⁵⁾⁽²⁶⁾

白須淨真逐一分析了這四位股肱謀主，稱宋配·氾瑗為敦煌人，陰澹祇是擔任過敦煌太守，而陰充則無殘存資料，並云：“像這樣對張軌的股肱謀主進行考察，很顯然，他們不像張軌那樣來自於外部的勢力，而是河西，特別是敦煌為中心的本地豪族與名族”。⁽²⁷⁾白須氏持論嚴謹審慎，雖然他肯定了以宋配·氾瑗為代表的敦煌大族的作用，卻對二陰的郡望未作直接的判斷，而是置於較為寬汎的河西範疇之中。他顯然是不太相信『屠項春秋』陰澹為敦煌人的說法，這可能是因為該說法在現存的此前著述中沒有出現過。崔鴻原書在北宋修撰的『新唐書』卷 58 「藝文志二」中猶被記載，且在『通鑑考異』與『御覽』裏常被引錄，而到南宋時多已不見著錄，說明宋代已經亡佚。⁽²⁸⁾屠·項輯本因未注明史料出處，有些史實於現存他史無徵，故曾被視作偽書而難以皆被信從，像陰

(22) 『晉書』卷 86 「張軌傳」(p. 2223) 載其病風後，“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司馬] 模乃表停之”；『通鑑』卷 86 胡三省注(p. 2736) 引『考異』曰：“『晉春秋』作‘張澹’，今從‘張軌傳’”；而『王隱晉書』卷 7 「張軌」(p. 325) 則作“陰澹”，但注云“新書作楊澹”；『屠項春秋』卷 70 「前涼錄一·張軌」(p. 890) 徑作“陰澹”。對比上文所引“前涼錄六·陰澹”“州請為治中從事。澹割身訴枉，軌任為股肱，參與機密，轉督護參軍·武威太守。軌保涼州，澹之力居多”等語，應作陰澹為確。

(23) 『屠項春秋』卷 75 「前涼錄六·陰澹」，p. 932；卷 97 「北涼錄四·陰興」，p. 1089。

(24) 『續敦煌實錄』卷 3 「陰澹（弟鑾）」，p. 62；卷 5 「陰興」，pp. 103-104。

(25) 『重修敦煌縣志』卷 10 「人物志上」，pp. 260-261；『敦煌志』卷 12 「人物」，p. 969。

(26) 『敦煌學大辭典』“陰澹”條（汪汎舟撰），p. 340。

(27) 白須 1980, pp. 35-36。

(28) 參邱久榮 1992；陳長琦 & 周羣 2005。關於司馬光『通鑑考異』所參考的『十六國春秋』及諸種略本，請參町田 2000。

澹為敦煌人這一說法不為白須氏所信從，即或如此。不過趙儼生則認為，“它所著錄的某些歷史資料，多為『晉書』『魏書』所不備，此即其不可搖撼的價值之所在”，⁽²⁹⁾ 從這個角度看，陰澹是否為敦煌人則需要進行一番仔細的考證纔可。

首先應該注意的是陰澹之弟陰鑒。據『魏書』卷 99「私署涼州牧張寔附張駿傳」記載，“軌保涼州，陰澹之力，駿以陰氏門宗強盛，忌之，乃逼澹弟鑒令自殺，由是大失人情。駿既病，見鑒為祟，遂死”。張澍因其兄弟關係而將陰鑒也列為敦煌人。但屠·項輯『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既未為陰鑒列專錄，且在顏之推『還冤記』中又稱作“武威陰鑒”：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鄧（陰）鑒，⁽³⁰⁾ 以其宗族強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鑒謀反。駿逼鑒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鑒在側，遂死。⁽³¹⁾

屠·項二氏記兄陰澹為敦煌人，而顏氏則稱弟陰鑒望出武威，那麼前涼時代聲勢煊赫的陰氏家族究竟是敦煌人還是武威人，抑或為同一家族之分支？⁽³²⁾

目前所見唐宋時代的諸姓氏書中，陰氏有南陽·始平·武威·吳興·廣樂諸望，而無敦煌望。『姓纂』卷 5 “陰”條云：“武威陰：後漢衛尉陰綱孫常，徙武威姑臧。八代孫襲家荊州作唐”；廣樂望提到的北周陰嵩，亦“狀稱本武威人”，由此可知東漢時陰常西徙武威，逐漸形成了武威郡望。惜從陰常至其八代孫陰襲之間，『姓纂』沒提到前涼時期的任何人物；而在史籍中，漢晉間河西陰氏人物亦極鮮見，直到前涼時纔異軍突起。趙以武從武威陰氏的角度出發，對它與

(29) 趙儼生 1986, p. 12.

(30) 鄧·陰鑒為同時代之人，但一在江南，一在西北，地隔遙遠，且鄧鑒的籍貫為高平，與武威無涉，此處之“鄧”當為“陰”字之誤。

(31) 『還冤記』, p. 3379.

(32) 姜伯勤 2002 (p. 42) 曾說，高昌世族門閥主要源出涼州大姓，其中高昌陰氏出自“(武威)敦煌陰氏”，此種表述方法顯得較為模糊。

(33) P. 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嘉政)修功德記」云：“其先源南陽新野人也”，參『法藏敦煌』32, p. 230; S. 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並序」記載雍州始平郡·涼州武威郡·湖州吳興郡皆有陰氏，參『英藏敦煌』3, pp. 210-211；『姓纂』2 (p. 39) 卷 5 “陰”條有南陽新野·武威·廣樂諸望。

敦煌陰氏的關係作了如下分析與推斷：

武威姑臧陰氏一支於張軌出任涼州刺史之前，其宗族內部大概又有遷居敦煌的分支出現。張軌謀主之一的陰澹，據明人屠喬孫『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所記為敦煌人。屠本不明出處，有“偽書”之稱，當然不能完全憑信。但是『晉書』「苻堅載記」卻明確記載有“敦煌陰據”，說明陰氏確有自稱敦煌籍的情況存在。敦煌陰氏當然是從武威陰氏族中分離出去的，很可能是因家族內訌引起他遷敦煌所致。……敦煌陰氏分支衍成大姓望族，看來是在隋唐之世。……敦煌陰氏在前涼時即有記載可按，說明魏晉時武威陰氏宗族內部有過再徙敦煌而居的分化。⁽³⁴⁾

無論是從陰氏自東漢到前涼的縱向時間觀察，或者是自中原經武威再到敦煌的橫向空間路線來看，趙氏推斷敦煌陰氏從武威析出，是有道理的；但他說在張軌刺涼之前的魏晉時代陰氏從武威徙居敦煌卻無例證，而推測西徙的原因為家族內訌則純屬臆斷。楊學勇從敦煌陰氏的角度出發，首先分析了它有南陽·武威·始平三個郡望源流，並推測“可能敦煌陰氏始於陰澹一支。此外有關材料尚未發現，又在敦煌文獻中陰氏絕大多數都以武威望自稱，所以敦煌陰氏起碼有一支源自武威應沒問題”，並論說了前涼中期陰澹為了避禍而從武威移居到了敦煌：

陰澹弟“武威陰鑒”為武威人，而「前涼錄」說陰澹是敦煌人，或許是因張茂時陰澹作敦煌太守，又值張駿忌害陰氏門宗強盛而殺陰鑒，迫使陰澹居留敦煌遠離政治中心以避免被猜忌，從而後來成了敦煌人，不過此時的敦煌應指里貫而非郡望。⁽³⁵⁾

(34) 趙以武 1993, p. 13.

(35) 楊學勇 2004, pp. 97-100. 又，馬德 1997 (p. 91) 亦云：“武威陰氏興盛於十六國前涼時代，實際上就是敦煌陰氏。不過此陰氏家族當時在敦煌並不是望族，而是在前涼時代因陰澹輔佐張軌成就大業而成為鼎盛之家”。他雖然也認同敦煌陰氏始自陰澹，與武威陰氏本屬同支，但對敦煌陰氏的形成過程卻未作論說。

筆者贊同楊氏的推論。陰澹擔任過涼州治中從事・督護參軍・武威太守等職，⁽³⁶⁾此外他還當過左將軍，並在張茂時出任敦煌太守。張駿時其弟陰鑒遭誅，陰澹則到曾經任職過的敦煌避禍，大概從此居留敦煌，成為敦煌陰氏的始祖；稍後在張重華・張祚時有一位陰顥，很可能也定居於敦煌⁽³⁷⁾；到前涼末，史籍中出現了前秦“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之語⁽³⁸⁾，反映了前涼中後期敦煌陰氏的郡望逐漸形成。也正因此，《屠項春秋》「前涼錄」把陰澹當作敦煌人，而陰鑒仍被顏之推稱為武威人，與陰澹同為張軌股肱謀主的陰充自然也沒有被屠・項二氏認為是敦煌人。這印證了趙儼生所說的話，屠・項輯本著錄的某些歷史資料雖不見於《晉書》《魏書》，卻確有其珍貴的史料價值，具備卓越的史識，是不可輕易否認的。

然而頗堪玩味的是，唐代前期的敦煌文獻 P. 2625「敦煌名族志」殘存張・陰・索三氏，陰氏部分書於中間，首尾完整，但對隋唐以前隻字未記，僅從“隨（隋）唐已來，尤為望族”敘起，接下來羅列了唐代的一些陰氏人物。⁽⁴⁰⁾這種做法與同一族志中張・索二氏的情況完全迥異，似乎表明在敦煌地區，唐代陰氏與

(36) 『隋書』卷 33 「經籍志二」云：“『魏紀』十二卷左將軍陰澹撰”， p. 957.

(37) 值得注意的是，在樓蘭出土簡紙文書中出現了一些陰姓人物，如 L.A.II.ii — 孔紙 7 “濟逞白報：陰姑素無患苦，何悟奄至？” L.A.V.i.2 — 沙木 889 “陰游”等，參『樓蘭集成』，pp. 160-161, 360-361。這些位於敦煌以西的樓蘭地區的陰氏人物，或許與敦煌具有某些關聯。前件文書中的“濟逞”，據小山 1972 (pp. 120-128) 考證，樓蘭簡紙文書中的“張超濟”“張濟逞”“濟”，即使不能斷定為同一人，至少也屬於同一時代的同一集團，並將張濟文書的年代上・下限考訂為 310-333 年。孟凡人 1995 (pp. 20-26) 根據書法與內容等特徵，更是直接斷定為同人異名，雖然他不同意小山氏把文書中的“世龍”比定為後趙國主石勒，但判定文書年代為 310-330 年左右，則與小山氏相近。『樓蘭集成』(pp. 295, 278) 在繼承孟氏觀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考證張超濟在樓蘭為官的時間上限有可能在 324 年或在稍前不久，下限在 329 年稍後不久。因此，濟逞白報中的陰姑當亦在此期間，即前涼張駿執政時期。

(38) 『晉書』卷 94 「隱逸・宋纖傳」(p. 2453) 云：“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顥・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宋纖為敦煌效穀人，楊宣為敦煌太守，在太守之前省書“敦煌”二字（後文提到酒泉太守馬岌，則不省略“酒泉”二字），故推測陰顥很可能也是敦煌人。

(39) 『晉書』卷 113 「苻堅載記上」, p. 2894; 『通鑑』卷 103, p. 3244。陰據又見於『晉書』卷 86 「張軌附張駿傳」(p. 2238)，官任從事。

(40) 『法藏敦煌』16, pp. 329-330.

五涼陰氏沒有任何傳承關係，或者是在有意回避著什麼；而到歸義軍時期，一些邈真贊·墓誌銘中的敦煌陰氏人物在敘述其家族淵源時，也都不提及五涼陰氏，大多稱他們是上述族志中的北庭副大都護陰嗣監的後代，卻又追祖於武威陰氏。⁽⁴¹⁾⁽⁴²⁾

通過以上考辨，筆者論證了陰充·陰澹皆為武威人，但後者在前涼中期因任官避禍而成了敦煌人，以宋配·氾瑗為代表的敦煌大族在前涼王國的創建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⁴³⁾這也是張軌拉攏敦煌·武威大族，藉以鞏固自身政權的重要手段。若再考慮前涼初期太府參軍索輔·太府主簿令狐亞·武威太守張冉·酒泉太守張鎮等敦煌籍官員，就足以顯示出敦煌大族與前涼王國之間密切的政治關係了。

4. 前涼前期的兩次讒謠——敦煌張氏·武威賈氏等河西大族與前涼張氏的較量

前涼初期，張軌爭取到了敦煌宋·氾二氏與武威陰氏等河西大族的支持，但在張軌統治後期與張茂時期，河西地區先後出現了兩次讒謠，卻與敦煌張氏·武威賈氏有關，反映了這兩地最為顯著的頭等甲族與前涼張氏之間展開了爭奪涼州統治權的較量。

第一次讒謠發生在 308 年張軌患病中風之時：

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讒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梁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法·麴

(41) 如 P. 4660「河西節度故左馬步都押衙陰文通邈真贊」云：“門承都護，閥閱暉聯”；P. 3720「教授河西應管內都僧統陰海晏墓誌銘並序」云：“安西都護之貴派矣”。參鄭炳林 1992, pp. 194, 261。

(42) 如陰海晏之侄 P. 2970「唐故河西歸義軍節度內親從都頭守常樂縣令武威郡陰善雄邈真贊並序」云：“門承鐘鼎，代襲簪纓；族美珪璋，懿聯侯室”；P. 2482「陰善雄墓誌銘並序」云：“武威郡貴門之勝族也”。參鄭炳林 1992, pp. 475, 480。

(43) 『通鑑』卷 84 (p. 2650) 記載張軌出任涼州刺史後，“鮮卑為寇；軌至，以宋配·氾瑗為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卷 86 (p. 2708) 又云：“軌從之，遣中督護氾瑗帥眾二萬討〔韓〕稚，稚詣軌降。未幾，鮮卑若羅拔能寇涼州，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卷 88 (p. 2784) 又記載宋配為前鋒督護率軍勤王，擊敗秦州刺史裴苞。這裏都祇提到敦煌宋配·氾瑗二人，而未及武威二陰。

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⁴⁴⁾

“張氏霸涼”很可能是301年張軌出刺涼州之前就已經製造出來的讖言，當時是為安定張氏統治涼州作輿論準備。史載張軌“頗識天文”，善於卜筮，“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筴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在他達到河西之後，擴建了姑臧城，結合漢末博士敦煌侯瑾對其門人所說的“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的預言，“至是，張氏遂霸河西”。306年底，晉惠帝崩亡，懷帝即位，東海王司馬越輔政，西晉政權在內憂外患的夾攻下已經風雨飄搖，這使得涼州刺史張軌蠢蠢欲動，謀求割據河隴一隅。翌年，在涼州境內的張掖·武威等地，就出現了一些與“張”字有關的符瑞，如“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⁴⁵⁾最近，津田資久對魏晉至唐初張掖郡玄石的特徵作了系統的考察，其中就有前涼張軌時期的這次玄石祥瑞，這是張軌為了尋求割據涼州的正當性而特意編造出來的。⁽⁴⁶⁾

然而，僅言“張氏霸涼”或祇刻“張”字之玄石，並不足以當作張軌稱霸涼州的唯一根據。因為河西地區自漢代以來就有著名的敦煌張氏，湧現出了漢末的張奐·張芝父子，⁽⁴⁷⁾曹魏的張恭·張就父子，⁽⁴⁸⁾以及晉初“敦煌五龍”之一

(44) 《晉書》卷86「張軌傳」, p. 2223.

(45) 《魏書》卷99「私署涼州牧張寔傳」, p. 2193.

(46) 《晉書》卷86「張軌傳」, pp. 2221-2222。與張軌關係密切的西晉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廣曾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這其實也是身為星象家的張軌同僚為其“張氏霸涼”的讖言提供輿論支持。又參同書卷13「天文志下」「月五星犯列舍」條云：“永寧元年（301），自正月至於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p. 367.

(47) 《晉書》卷86「張軌傳」, p. 2223, 《御覽》卷50「地部十五·臨松山」引《十六國春秋》(p. 244)文字稍異：“晉元（永）嘉元年，張掖臨松山有石如‘張掖’字，‘掖’漸減，‘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四方安萬年’”。《屠項春秋》卷70「前涼錄一·張軌」(p. 889)多出“又蘭池送玄石大如丸，破之，中有‘必’字，青點白文書之”一句。

(48) 津田 2008.

(49) 《後漢書》卷65「張奐傳」, pp. 2138-2145.

(50) 《三國志》卷18「魏書·閻溫傳」, pp. 550-551.

的張龜等人物。⁽⁵¹⁾在河西，敦煌張氏的聲望與影響要比從隴右徙入的安定張氏大得多。上文說到的“晉昌張越，涼州大族”，其實就出自敦煌張氏。『後漢書』卷65「張奐傳」云：“張奐字然明，敦煌淵泉人也”，淵泉即深泉，唐人修『晉書』時因避高祖李淵之諱而改，位於敦煌郡東部的深泉縣（今甘肅省瓜州縣布隆吉鄉）。『晉書』卷14「地理志上」云：“元康五年（295），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廣至等五縣，分酒泉之沙頭縣，又別立會稽·新鄉，凡八縣為晉昌郡”，是知“晉昌張越”實即原居住於深泉縣的敦煌張氏，勢力很大，故被稱為“涼州大族”。敦煌張氏工於草書，世代相傳，書法人物輩出。⁽⁵⁴⁾東漢末有張芝·張昶兄弟，皆善草書；⁽⁵⁵⁾西晉時“敦煌有張越，仕至梁州刺史，亦善草書”，其為敦煌人，善草書，當是張芝的後代。因此，“張氏霸涼”這一讖言的出現，雖然為安定張氏割據涼州創造了輿論條件，但同時也為敦煌張氏與安定張氏爭奪涼州統治權埋下了伏筆。

在張軌大搞玄石符瑞的次年，亦即永嘉二年（308）二月，不巧的是他患了中風病，敦煌大族張越自認為符應“張氏霸涼”的讖言，趁機與其兄酒泉太守張鎮一起聯合武威賈氏·西平麴氏等河西大族，掀起了倒張軌的奪權鬥爭。張越弟兄暗地拉攏秦州刺史武威賈龜以代張軌，並勾結西平太守敦煌曹祐，“圖為輔車之勢”，還得到了涼州別駕西平麴晁的策應支持。但賈龜在其兄賈胤的勸說下，退出了這一行動，這可能是下文將要提及的張軌與賈氏之間的聯姻起了作用。之後，西晉派出袁瑜為涼州刺史，又被涼州治中陰澹赴長安為張軌訴冤而

(51) 『晉書』卷60「索靖傳」, p. 1648.

(52) 『後漢書』卷65「張奐傳」及李賢等注，校勘記，pp. 2138, 2156.

(53) 『晉書』卷14「地理志上」, p. 434。晉朝以晉名國，晉昌郡共有三個，除了涼州境內的晉昌郡外，還有兩處：一是并州新興郡下有晉昌縣，並云“惠帝改新興為晉昌郡”(p. 429)；二是東晉“桓溫平蜀之後，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p. 438)。

(54) 參陳琪 2007。不過所列唐五代的敦煌張氏人物，並非都擅長於書法。

(55) 『後漢書』卷65「張奐傳」云：“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p. 2144.

(56) 『書斷』下『能品一百七人·章草十五人·趙襲』, p. 136.

(57) 『晉書』『通鑑』『十六國春秋』皆未言賈龜之兄的名字，據『三國志』卷10「魏書·賈詡傳」裴松之注引『世語』(p. 332)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龜，從弟疋，皆至大官，並顯於晉也”，知為賈胤。

止。在這樣的情況下，張越遂從梁州潛回河西，在其兄張鎮及西平太守敦煌曹祐·西平大族麴佩的支持下，移檄廢軌，自表為涼州刺史，以敦煌張氏為首的河西大族倒張軌行動，使前涼政權面臨著嚴峻的危機與挑戰。

然而，張軌雖病，頭腦卻很冷靜，他採取四手策略，迅速粉碎了這一陰謀，平定了叛亂，鞏固了前涼政權的統治。第一，他假作姿態，宣稱“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並派人奉表到晉都洛陽，請求歸老。這是針對河西大族說的，故稱“貴州”，意圖是在觀察他們的動向。同時，他採納長史王融·參軍孟暢的建議，在姑臧城實施了戒嚴令。第二，對於處在腹心之地的武威大族賈氏，張軌採取聯姻策略，為子張寔娶賈摹之姊，獲得了他們的政治支持。這一聯姻對於瓦解敦煌張氏與武威賈氏的聯盟應該有著積極的作用。第三，對大多數敦煌大族採取團結拉攏的策略，從而達到了分化孤立張越的目的，是張軌策略最成功的體現。如武威太守敦煌張冉遣子張坦入京獻表，請求晉廷勿聽流言而有遷代；太府主簿敦煌令狐亞前往酒泉，說服了乃舅張鎮，進一步從內部分化了敦煌張氏；作為張軌首席謀主的敦煌宋配，則隨張寔南討西平，擊斬曹祐·田囂·麴儒。第四，對於西平太守敦煌曹祐與當地大族麴·田等氏實力派，則果斷地採取了鎮壓手段。很顯然，張軌非常注重與儒學高門的敦煌·武威大族的關係，採用籠絡·聯姻·分化等多種策略，以安撫為主；而對於偏處西平的武力強宗麴·田等氏，則派遣軍隊，兩路進討，加以剿滅。

由於張軌很好地處理了與河西諸大姓的關係，或拉或打，有效地分化了河西大族的聯盟，從而使張越孤立無援，東奔於鄴，鞏固了前涼王國的政治統治。

(58) 『晉書』卷 86 「張軌傳」, pp. 2223-2224.

(59) 張冉·張坦父子為敦煌人，僅見於『續敦煌實錄』卷 1 「張冉（子坦）」, p. 16.

(60) 武守志 1985, pp. 28-29.

(61) 『通鑑』卷 86 晉懷帝永嘉二年(308)二月條云：“張越奔鄴，涼州乃定”，p. 2736。按，『晉書』卷 104 「石勒載記上」(pp. 2708, 2726)載其起事之初，招集了“十八騎”，中有張越；又云：“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脰而殺之”。據小山 1972 (pp. 127-128) 對樓蘭出土張濟文書的考證，認為『晉書』「張軌傳」中的“晉昌張越”應即「石勒載記上」的石勒姊夫廣威將軍張越。『屠項春秋』卷 22 「後趙錄十二·張越」(p. 489) 記載“張越，上黨武鄉人”，這大概是因為張越與石勒的姻親關係，而將兩人的籍貫等同起來，忽略了他實際出自敦煌。

從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張越試圖篡奪涼州最高統治權，或者是張煦·令狐亞·宋配等大多數敦煌大族支持張軌，都說明了敦煌大族扮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

第二次讒謠發生在張茂統治時期：

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⁶²⁾
茂以為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跡，威行涼域。

此次主要是武威賈氏與前涼張氏的矛盾，但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張氏站在了賈摹一邊，也參與了這次事件。據『御覽』卷 397「人事部三十八·敘夢」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記載，敦煌郡主簿張宅夢見走馬上山，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索統為之解夢，稱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賈摹等謀反伏誅”。張宅請索統解夢一事，亦見於『晉書』卷 95「藝術·索統傳」，但傳文僅云“以謀反伏誅”，未說是與賈摹共同謀反，賴『十六國春秋』始知是賈摹之亂。張宅雖然沒有被張澍列入『續敦煌實錄』，但前涼王國仍實行漢代以來州郡辟署屬吏必用本地人的制度，尤其是前涼屬於地方割據政權，且張宅與索統同在敦煌，故推測他極可能也是敦煌人，甚或與張越家族有關。從這一事件可知，直到張茂執政時，敦煌張氏仍在蓄謀反抗，並與武威賈摹實行聯手，反映了河西大族與前涼張氏的持續較量。

(62) 『晉書』卷 86「張軌附張茂傳」, p. 2232. 『魏書』卷 99「私署涼州牧張寔附張茂傳」(p. 2194) 則云：“茂妻弟賈模兄弟謀害茂，茂殺之”；不過在校勘記〔一〕(p. 2210) 中已指出兩者之異，並稱按“‘手莫頭，圖涼州’之謠，則字當從‘手’上‘莫’”。從張茂對武威賈氏的打擊來看，與賈摹之姊結親者應是其兄張寔，而非張茂。又，308 年張軌中風後一度由張茂攝州事，314 年卒後則由張寔繼為涼州刺史，張寔·張茂兄弟之間可能因此積怨，而張寔與賈摹之姊相婚姻，以致在張茂時出現誅滅賈摹之事件。

(63) 嚴耕華 1997 (pp. 382-386, 862-867) 在考察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時，對長官·屬吏的籍貫進行了研究，認為漢代長官必用外籍人的制度已遭廢棄，而屬吏必用本境人的制度尚嚴格執行。

5. 前涼中期陰氏的誅戮及其西徙敦煌

如前所論，陰氏在前涼前期勢力極盛，陰充·陰濬是張軌的股肱謀主，陰氏其他人物如率軍勤王的陰濬·抗擊前趙的前鋒督護陰預·曾任鎮軍將軍的陰鑒⁽⁶⁴⁾，則形成了前涼軍界的實力派。但到前涼中期張駿執政時，卻“以陰氏門宗強盛，忌之，乃逼濬弟鑒令自殺，由是大失人情”⁽⁶⁵⁾。陰氏與張駿的交惡，“門宗強盛”祇是個表面現象，關鍵在於陰氏在張寔·張駿系與張茂系的權力鬥爭中站在了張茂一邊，故到張駿時遭到了誅戮打擊。學術界對這一問題向無關注，而這對武威陰氏遭到誅戮及其西徙敦煌卻至為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晉書』與『魏書』對前涼張氏的記載筆法有所不同，前者以張軌為傳主，附記其子孫；後者則以張寔為傳主，追述其父張軌，並附記其弟及子孫，且稱其為“私署”，這反映了兩書修史者對前涼王國的性格存在著不同的認識。『魏書』的撰寫距離前涼時代較近，且張寔既不馳援長安，致使京師淪陷，愍帝被俘而亡；又拒絕奉用東晉年號，仍用西晉愍帝建興年號紀年，故趙向羣云：“應當說，張寔是前涼割據政治的實際締造者，從張寔起，前涼躋身

(64) 前涼時還有一位陰監，其任別駕，勤王晉室，事見『御覽』卷 124, p. 599；『何鏗春秋』卷 7, p. 1146；『屠項春秋』卷 72, p. 888；『春秋輯補』卷 67, p. 482。其作為阻截司馬保的將軍，事見『晉書』卷 86, p. 2230；『通鑑』卷 91, p. 2876；『春秋輯補』卷 68, p. 490；而『屠項春秋』卷 72 (p. 897) 則云：“遣將軍陰鑒（一作監）逆保”。又，323 年前趙呼延寔進攻前涼，駐守在桑壁的涼將，一作寧羌護軍陰鑒，見『晉書』卷 86, p. 2231；『通鑑』卷 92, p. 2914；而『春秋輯補』卷 68 (p. 492) 則作寧羌護軍陰監。可見從明代起，已開始把陰鑒·陰監混同為一人了。『涼州府志』「人物卷三」“陰鑒”條 (pp. 415-416) 對以上兩項則統一作“陰鑒”，而無“陰監”。在『晉書』『十六國春秋』中，類似於“監”“鑒”這種音近致誤的情況比比皆是。又據『晉書』卷 86 (pp. 2230-2231) 記載，司馬保為前趙劉曜所逼而“遷於桑城”，謀奔前涼，卻遭到涼將陰監的阻截；而劉曜派遣“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兩者都受到前趙劉曜的進攻，地點桑城疑即桑壁，故頗疑陰監亦即陰鑒。唐代敦煌文獻 P. 2625 「敦煌名族志」中的“陰嗣監”，在 P. 2005 「唐沙州都督府圖經」中寫作“陰嗣鑒”，即為同一人，參『法藏敦煌』1, p. 61；16, p. 329。馬德 1997 亦云：“這裏的陰嗣鑒即陰嗣監，很明顯，這裏是因為武則天當皇帝造輿論而改監為鑒；或者說，成書於武則天倒臺之後的「敦煌名族志」改鑒為監，改名也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p. 94。

(65) 『魏書』卷 99 「私署涼州牧張寔附張駿傳」, p. 2195.

於十六國之列⁽⁶⁶⁾，可見『魏書』雖被稱為“穢史”，但對前涼王國的記述卻很有見地。而『晉書』既不將前涼張氏列諸「載記」，又在敘述其忠晉思想與獨立割據的矛盾時常顯出文筆上的尷尬。尤應注意的是，兩書對張軌晚年病風後二子張寔・張茂的有關記載頗有歧異，這透露出兄弟倆為了奪權在明爭暗鬥。『魏書』卷 99 「私署涼州牧張寔傳」云：

軌年老多疾，拜寔撫軍大將軍，副涼州刺史。未幾，軌風病積年，二子代行州事。

『晉書』卷 86 「張軌傳」則云：

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

比較兩書可以發現，張寔作為長子，完全有資格代父掌政，然而『魏書』先說他“副涼州刺史”，不久又云“二子代行州事”，後者透露出張茂似曾取代乃兄張寔掌政涼州，個中原因不得而知。而『晉書』徑稱“使子茂攝州事”，省掉了張寔副涼州刺史掌政之事。由此可見，張寔・張茂兄弟在乃父病重之際，曾出現了某些不和諧的跡象。

314 年，張軌卒，張寔上臺。『晉書』卷 86 「張軌附張寔傳」云：“建興（313-317）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推立他上臺的“州人”即『通鑑』卷 89 晉愍帝建興二年（314）條提到的長史張璽等人：“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己丑，軌薨；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⁶⁸⁾”，而原先“攝州事”的張茂則未能當上涼州刺史。

(66) 趙向羣 1996 「前涼篇」，p. 63。

(67) 『北齊書』卷 37 「魏收傳」，p. 489；『北史』卷 56 「魏收傳」，p. 2032。參周一良 1997, pp. 256-292。

(68) 『春秋輯補』卷 68 「前涼錄二・張寔」記載較為混亂：“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二年（314），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建興元年（313），長史張璽・汜禕等表寔嗣位”，p. 487。

張寔在位六年，320年為弟張茂所代。張寔被認為是死於一夥來自京兆的左道之徒的手，關於這起事變的原因及其宗教屬性，至今未能得到確切的解釋。⁽⁶⁹⁾但不管如何，張寔卒後，是由弟張茂繼位。『晉書』卷86「張軌附張茂傳」云：“太興三年（320），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為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這裏又出現了“州人”一詞，即『通鑑』卷91晉元帝太興三年（320）條提到的左司馬陰元等人：

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⁷⁰⁾

很顯然，以左司馬陰元為首的“州人”屬於張茂勢力集團，而與張寔·張駿系相敵對。這位陰元，在明代何鏗輯『十六國春秋』中則被寫作“陰元年”。前涼人物在史籍的傳抄過程中，姓名被抄錯，甚至出現張冠李戴的情況，是屢見不鮮的。以前涼國主為例，張寔又寫作張實·張宴·張晏，張駿又作張俊，張耀靈又作張靈耀·張曜靈·張靈曜，張玄靚又作張玄靖·張元靖·張玄靜。至於其他人物，字形相近而誤者，如宋與宗·曾與魯·黑與里；偏旁相誤者，如摹

(69) 『晉書』卷86「張軌附張寔傳」(p. 2230)云：“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這幫來自京兆的左道人物，聚集於姑臧城南的天梯第五山，信眾上千，甚至連張寔身邊的親信都屬於這個集團，並最終殺害了張寔，足見其勢力非同小可。同書卷122「呂光載記」(p. 3059)亦記載，京兆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於天梯山”；卷129「沮渠蒙遜載記」(p. 3192)記載段業“尤信卜筮·讖記·巫覡·徵祥”，他與劉弘等籍貫既同，又都居住在天梯山，還信奉“左道”之術，未知是否有什麼關係。王素 1985 認為，“劉弘所挾‘左道’，有‘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的宗教儀式，其為火祆教決無疑問”，p. 227。

(70) 又參『御覽』卷124「偏霸部八·前涼張茂」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涼）錄』，p. 599。

(71) 『何鏘春秋』卷7「前涼錄·張實」云：“實左司馬陰元年以實既被害，子駿沖幼，宜立長君，乃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牧”，p. 1147。

與模・僚與寮・凝與疑；甚至還有張冠李戴者，如田豹作田邈・宋脩作宗悠・黃平作馬興平。“元”“充”二字字形相近，很可能左司馬陰元就是前涼初年張軌的股肱謀主陰充。⁽⁷²⁾若這一推斷成立的話，以陰充（元）・陰澹・陰鑒為代表的武威陰氏家族，先是在張軌病風之時，支持張茂攝行州事；後來又在張寔去世之後，扶立張茂為國主，從而與張寔・張駿系產生了政治矛盾，並最終導致了陰氏在張駿時遭到誅戮打擊。張茂系與張寔・張駿系的矛盾，還可以從上節所述賈摹事件中看出，張茂誘殺張寔妻弟武威大族賈摹，應該是對張寔系勢力的進一步清理。

324年，張茂卒，侄張駿立。陰氏家族在張駿時遭到誅戮打擊，這可能與陰充（元）等推立張茂上臺有關。蓋此時陰充（元）已卒，陰氏家族中被誅的陰鑒，是與陰充（元）同為張軌股肱謀主的陰澹之弟，在張茂時曾任寧羌護軍，張駿時為鎮軍將軍，是前涼軍界的實力派人物。這一狀況，自然更加引起了張駿的不滿，遂令主簿魏纂誣陷陰鑒謀反，逼其自殺，這實質上是在清理張茂系的勢力，削奪陰氏的軍事權力，但張駿也由此大失人情，削弱了前涼王國的統治基礎，從此走向了衰落。

陰澹在張茂時外任敦煌太守，他一手抓經濟發展，大力興修水利，開渠溉田；⁽⁷³⁾另一手抓文化建設，尊師重教，禮待著名學者索襲・索紈等人，大力發展教育，為敦煌地區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當張駿時武威陰氏在遭受誅戮打擊之後，陰澹為了避禍，西徙到了曾經任官的敦煌地區。從陰澹身上可以看出，這時陰氏已開始從軍界轉向儒學，積極向以經學傳家的敦煌傳統大族索氏等靠近，並且撰寫了『魏紀』十二卷，⁽⁷⁴⁾努力使其家族從武力強宗轉變為儒家世族。在此之後，著名的敦煌學者宋纖“惟與陰顥・齊好友善”，⁽⁷⁵⁾也印證了敦煌陰氏

(72) 後藤 1967 (p. 31) 將“陰充”又誤錄作“陰克”。

(73) P. 2005 「唐沙州都督府圖經」“七所渠”條末列“陰安渠：長七里。右在州西南六里甘泉水上。據「西（前）涼錄」，敦煌太守陰澹於都鄉斗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利而安，因以為號”，『法藏敦煌』1, p. 46.

(74) 『晉書』卷 94 「隱逸・索襲傳」(p. 2449) 云：“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卷 95 「藝術・索紈傳」(p. 2495) 載其回歸敦煌，“太守陰澹從求占書”。

(75) 『隋書』卷 33 「經籍志二」, p. 957.

(76) 『晉書』卷 94 「隱逸・宋纖傳」, p. 2453.

的這一趨向。到前涼末年，陰據被認為是敦煌人，說明已經正式形成了敦煌陰氏的郡望。在前涼亡國之後，陰氏家族仍然居住在敦煌，如在立國敦煌的西涼時，有西安太守陰亮⁽⁷⁷⁾·武威太守陰訓·姑臧令陰華，北涼時有助教敦煌陰興⁽⁷⁸⁾。尤其是李暠以陰訓·陰華父子為其僕置的武威郡守與姑臧縣令，表明了敦煌陰氏的祖根原在武威，西涼借助其勢力來謀求東擴，試圖從北涼手中奪取武威。然而，無論是武威陰氏或是其分支敦煌陰氏，在唐代編撰「敦煌名族志」“陰氏”條時卻根本沒有提及隋唐以前的這些本地先人。

6. 前涼後期敦煌宋氏的執政及其夷滅

從西晉初年的宋質身上，已顯示出了敦煌宋氏作為本地區武力強宗的面貌特徵，這一尚武特徵直到前涼時期依然如此，如宋配作為張軌四大股肱謀主之首，雖然其貌不揚，卻具備卓越的軍事才能。他先任司馬，受命鎮壓鮮卑若羅拔能，“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其次在平定張越之亂時，又受命與尹員率領“步騎三萬討祛”，斬殺與張越東西呼應的西平太守敦煌曹祛；最後率師東向勤王，“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沖左右”，歸途中又討平了曹祛餘黨麴儻，並擔任西平太守。可以說，宋配是前涼王國的開國元勳，也奠定了敦煌宋氏的政治地位。

『魏書』卷 52「宋繇傳」記載了前涼時期宋配家族的世系：“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寮，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寮為張邕所誅”。從宋配到子宋悌·孫宋寮，一直在前涼王國中任職，而宋寮為張邕所誅，即在下文所述張邕誅滅宋澄的事變中一同遇害的。

前涼後期，張祚從侄張曜篡手中奪得權位，並且圖謀稱帝，用兵於驪靬戎，國政暴亂。355 年，張祚宗人河州刺史張瓘起兵造反，得到了敦煌宋氏的響應與

(77) 『晉書』卷 87「涼武昭王李玄盛傳」, p. 3259.

(78) 『魏書』卷 52「陰仲達傳」, p. 1163.

(79) 『魏書』卷 52「劉曜傳」, pp. 1160-1161. 同卷「索敵傳」(p. 1163)云：“初，敵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這裏的“州”為涼州，索敵是敦煌人，“鄉人”可能是狹義地指敦煌人，但也可能是廣義地指涼州人。

(80) 『晉書』卷 86「張軌傳」, pp. 2222-2225.

支持。該年七月，“驍騎將軍敦煌宋混兄脩，與祚有隙，懼禍。八月，混與弟澄⁽⁸¹⁾西走，合眾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宋混兄弟“西走”，自應是回到故鄉敦煌招集武裝，一呼而合眾萬餘，勢力不可小視。這萬餘人中，除了敦煌漢族大姓之外，還有許多少數民族，如『御覽』卷 124「偏霸部八·前涼張祚」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云：“混西奔，招合夷晉，眾至萬餘人，還向姑臧”，這充分顯示了敦煌宋氏在河西走廊西部的胡漢民眾中頗有影響與號召力。在向前涼國都姑臧進軍的途中，聽到舊主張曜靈被殺，“涼宋混軍於武始大澤，為曜靈發哀。⁽⁸²⁾閏月，混軍至姑臧”，與張瓘弟張琚·子張嵩聯合攻城，殺死張祚，扶立張玄靚。敦煌宋氏與前涼宗室張瓘的聯合，很可能是由於張瓘和敦煌有著密切的關係。P. 2625「敦煌名族志」“張氏”條云：“□□[寧戎]校尉張瓘領兵東來，□□郡城東南七里，子憑，因□□□。憑子璽，字仲嚴，漢豫□□□，晉涼興令。自晉已後，□□郎將張慶方，即其後也”。池田溫指出，這是敦煌張氏三個系譜中的張慶方祖上的家系，始祖即為張瓘，他曾領兵到過敦煌，子孫遂定居於敦煌。文書前殘，族志中張瓘的官銜，在“校尉”之前可補“寧戎”二字，『魏書』卷 99「私署涼州牧張寔附張駿傳」云：“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城·漢中八郡為河州，以其寧戎校尉張瓘為刺史”，『通鑑』卷 97 系此事於晉穆帝永和元年（345），可知該年張瓘從寧戎校尉遷為河州刺史，此前他已遷居敦煌，與當地的宋氏家族締結了較為密切的關係。

359 年，敦煌宋氏又討滅了試圖篡位的張瓘兄弟，宋混·宋澄兄弟相繼執掌前涼大權，但次年復為右司馬張邕所誅。『晉書』卷 86「張軌附張玄靚傳」云：

(81) 『通鑑』卷 100, p. 3148.

(82) 『通鑑』卷 100, p. 3149.

(83) 『法藏敦煌』16, p. 329.

(84) 池田 1965, pp. 15-16. 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也有自稱為前涼安定張氏的後代，不過沒有提到張瓘，而是稱張天錫之子孫，如 P. 2991「講論大師毗尼藏主和尚寫真贊並序」云：“和尚俗性（姓）張氏，香號靈俊，即清河郡天錫之貴系矣，福星膺胎，遂為敦煌人也”；P. 3718「唐河西節度押衙知應管內都牢城使張公生前寫真贊並序」云：“公字良真，則前涼天錫弟（第）二十八代之雲孫矣”，參鄭炳林 1992, pp. 323, 421.

瓘兄弟強盛，負其勳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瓘，盡夷其屬。玄覲以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覲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覲乃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共輔政。

前述宋寮為張邕所殺，說明宋混與宋配出自同一家族。早年喪父的宋繇曾說：“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衡贍自厲，何以繼承先業！”⁽⁸⁵⁾所謂“門戶傾覆”，即指敦煌宋氏在這次事變中舉族遭到殺戮的慘劇，後來張天錫在誅討張邕時，亦宣稱“諸宋何罪，盡誅滅之？”⁽⁸⁶⁾

在前涼王國中，敦煌宋氏人物頗多，擔任了從中央到地方上的各級官職。宋氏家族的命運不僅與陰氏類似，而且其家族性格特徵也極為相若，都是前涼軍界的實力派，後來又從武力強宗逐漸轉變為儒家世族。施光明曾對五涼時期的敦煌宋氏家族進行專門考察，簡略敘述了宋氏人物的仕宦浮沉及其與諸涼王國的關係；他還分析了宋氏家族具有崇尚武功與儒學兩種特徵，並對這一現象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討。⁽⁸⁷⁾在前涼軍界，除了上述七人之外，至少還有以下七人：張寔時的威遠將軍宋毅，張駿時的中堅將軍宋輯，張重華時的大夏太守宋晏·宛成都尉宋矩·將宋秦，⁽⁸⁸⁾張玄靜時的右將軍宋熙，⁽⁸⁹⁾張天錫時的宣威護軍宋皓，⁽⁹⁰⁾他們與前涼王國相始終，是敦煌宋氏作為武力強宗的真實寫照。在前涼初期的宋配身上，軍事才能非常突出；即使到後期，宋氏家族仍保持著這一門風特徵，如司馬光稱宋混“性忠鯁”；宋矩在『晉書』中被列入「忠義傳」，他曾對後趙大將麻秋說：“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

(85) 『魏書』卷 52 「宋繇傳」, p. 1152.

(86) 『晉書』卷 86 「張軌附張玄覲傳」, p. 2249.

(87) 施光明 1991.

(88) 以上四人，見『晉書』卷 86 「張軌傳」, pp. 2229, 2235, 2241.

(89) 『晉書』卷 107 「石季龍載記下」, p. 2781.

(90) 『初學記』卷 8 「州郡部」“隴右道第六”條，上冊, p. 180.

(91) 『通鑑』卷 104, p. 3275.

(92) 『通鑑』卷 100, p. 3175.

主覆宗，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這些都體現了敦煌宋氏武勇忠義的家族門風。⁽⁹³⁾

但在前涼後期，部分宋氏人物則開始從武力強宗向儒家世族轉變，如宋纖“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纖注《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敦煌太守楊宣、酒泉太守馬岌都稱歎他“身不可見，名不可求”，“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張祚徵辟他為太子友·太子太傅，但宋纖厭惡政治，竟不食而卒。⁽⁹⁴⁾ 360年，敦煌宋氏遭到滅門之誅，但到西涼時重整門戶，得以再度崛起，這裏的一個關鍵人物是宋繇，前涼末年他曾“至酒泉，追師求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在他身上典型地反映了敦煌宋氏在前涼後期完成了從武力強宗到儒家世族的角色轉變。

7. 前涼時期的其他敦煌大族——以氾·索·令狐氏為中心

除了以上所論張·陰·宋三氏之外，前涼時期的敦煌大族主要還有氾·索·令狐·曹等氏，以及謝·車·劉·郭氏等小姓。與張氏一樣，氾·索·令狐·曹四氏是漢代以來敦煌地區的傳統舊族，早在東漢中期，就已完成了從軍功豪族到儒家世族的身份轉變；到西晉時的“敦煌五龍”中，索氏居三，氾氏一位，可謂人才輩出，文化程度甚高。在前涼王國中，敦煌曹氏在曹祐參加張越之亂被斬殺之後，勢力大衰；而氾·索·令狐三個家族參政入仕的人物甚多，但他們與張·曹·陰·宋四氏的性格不同，既未像張·曹二氏那樣野心勃勃地去奪權，也不像武力強宗的陰·宋二氏遭到猜忌與誅戮，成為始終支持前涼王國的穩定力量。這亦表明，氾·索·令狐三氏以經學傳家，通經致仕，形成了以儒宦為根基的成熟的世家大族，深刻懂得在十六國亂世中的生存之道。

(93) 『晉書』卷 89 「忠義·宋矩傳」, p. 2320.

(94) 當然，敦煌宋氏家族也出現了像宋晏·宋秦·宋皓那樣的投降者。不過宋晏之降後趙，實則為大夏護軍梁式叛降而被執；宋皓之勸張天錫投降前秦，是識時務，後來他擔任前秦酒泉太守，西拒呂光，效忠而死。參『通鑑』卷 97, pp. 3072, 3076；卷 106, pp. 3353-3354.

(95) 『晉書』卷 94 「隱逸·宋纖傳」, p. 2453.

(96) 『魏書』卷 52 「宋繇傳」, p. 1152.

S. 1889「敦煌氾氏家傳並序」後部殘缺，至前涼氾瑗止，羅列了西漢至前涼間的敦煌人物凡 12 人，其中西漢 1 人，東漢 3 人，不明朝代 1 人，其餘 7 人皆屬前涼，出任前涼王國各級官吏。⁽⁹⁷⁾另外，前涼時代敦煌氾氏見諸史籍的還有西晉郎中氾騰，他回到敦煌後拒不出仕於前涼，“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足見氾氏家族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宗族基礎；見諸墓葬的有氾心容，敦煌新店臺出土的 60 M 1：27 陶罐上有墨書銘文：“升平十三年（369）閏月甲子朔廿一日壬寅張弘妻氾心容盛五穀餅”。『晉書』卷 86「張軌附張重華傳」記載張弘與後趙·前秦作戰，沒於秦軍；張天錫時氾心容卒，時代相去不遠，從墓葬為單身葬來看，兩人當為夫婦，“推測或許是張弘戰死異鄉，並未歸葬之故”。⁽⁹⁸⁾張·氾二氏通婚，是敦煌當地大族之間的婚姻網絡現象。

雖然家傳不免有溢美之辭，但從中也可看出氾氏家族具有經學傳家，明於吏幹，清正耿直等性格特點，大多出任前涼王國的各級文官，而很少出沒於軍界。首先，從學術師承來看，氾禕“事師司空索靜（靖），通三禮·三傳·三易·河洛圖書，玄明究筭曆”；氾昭“弱冠從賢良同郡索襲受業”；氾緒“嘗於當郡別駕令狐富授（受）『春秋』『尚書』”，這裏涉及到了敦煌本地的氾·索·令狐三氏，反映了這三個家族以儒學經術為根基的共同性格。其次，與索·令狐二氏不同的是，氾氏家族不畏強權，清正耿直的特徵尤為鮮明，如氾禕，“字休臧，敦煌人。為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遭到酒泉太守馬漢與督郵張休祖的彈劾，左遷居延令；⁽¹⁰⁰⁾其孫氾淳“剛鯁峻直”，“明筆直繩，好刺舉，為朝士豪貴所忌”；氾昭“為人方正，好面折直言，退不談人之非”，“在職清平，好理枉屈”，並被張寔選為武威

(97) 王仲犖 2007 (p. 183) 云：“「氾氏人物傳」列紀人物，凡東漢一人，其餘悉是前涼時人”，不確。

(98) 『晉書』卷 94「隱逸·氾騰傳」，p. 2438。『姓纂』4 (p. 26) 卷 9 “氾”條敦煌望記載晉代除氾騰外，還有一位張掖太守汜彥，可能也與前涼有關。

(99)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組 1974, pp. 196-198.

(100) 『御覽』卷 427「人事部六十九·正直下」引『前涼錄』，p. 1965。關於此條記事，S. 1889「敦煌氾氏家傳並序」記載有異，如“福祿”誤作“祿福”，“馬漢”作“馬模”，張休祖所說的“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乎”更是換作了氾禕的“君不聞寧逢三千頭狼，不逢汜休臧”。這很可能是在編寫家傳時，為了美飾自家而作了改編。但不管何者，都能說明氾禕的剛直性格。

從事，使“豪傑望風慄服”⁽¹⁰¹⁾。

索氏在前涼王國任職人數更多，至少有 15 人，既有忠心進諫的文臣・勇冠三軍的武將，又有飽學經術的學者・救世經濟的人才。最典型的是在學術文化上，索氏以經學傳家，兼通內緯，湧現出諸多著名學者，如索襲“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啟發”⁽¹⁰²⁾；索統“少遊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¹⁰³⁾。他們都隱居不仕，敦煌太守陰澹欲請索襲為三老，索統為西閣祭酒，皆遭堅辭。尤應注意的是，索綏在張駿時擔任儒林祭酒，著有『涼春秋』等；索商在張天錫時為校書祭酒，控制了前涼王國的儒學教育與文化典籍事業。其次，索氏家族人物常常文武雙兼，在軍事上也有出色的人才，如張重華時的軍正將軍索遐，與謝艾率軍擊破後趙軍隊，討伐鮮卑斯骨真，取得大捷；又如“索苞有文武材”，“每征伐寇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以及以善射聞名的索孚。再次，前涼初期太府參軍索輔勸說張軌棄布用錢，“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¹⁰⁴⁾，而且在“張軌時，西湖致金胡餅，皆拂菻作，奇狀，並人高，二枚”⁽¹⁰⁵⁾，使前涼經濟與絲路貿易獲得了發展。

(101) S. 1889「敦煌氾氏家傳並序」，《英藏敦煌》3, p. 169.

(102) 『晉書』卷 94 「隱逸・索襲傳」, pp. 2448-2449.

(103) 『晉書』卷 95 「藝術・索統傳」, p. 2494. 在美國 The Gest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所藏敦煌文獻「太上玄元道德經」尾部，也出現了“建衡二年庚寅（270）五月五日敦煌郡索統寫已”的題記。饒宗頤 1955 (p. 2) 云：“考建衡為吳主孫皓年號，二年即晉武帝泰始六年（西元 270），時西北諸郡早已入晉版圖，統以敦煌人而書建衡年號，疑其人於是時適居吳，或統入太學時，所依為主人之父老，與東吳道家有深切關係”；該文“補記”(pp. 22-23) 又推斷索統與“敦煌五龍”之索紹・索綱，索靖之子索繩・索紓，以及索綏是同輩人，為索靖的子侄輩。又參 MOTE 1986. 然而，池田 1990 (p. 72) No. 16 認為該寫本疑偽，又參附圖 (p. 67) 圖 193；BOLTZ 1996 考證推斷，該寫本可能寫成於 735-960 年。

(104) 『屠項春秋』卷 75 「前涼錄六・索綏」, p. 931.

(105) 『晉書』卷 86 「張軌附張天錫傳」, p. 2250.

(106) 『御覽』卷 437 「人事部七十六・勇五」引劉彥明『敦煌實錄』, p. 2011.

(107) 『御覽』卷 744 「工藝部一・射上」引『前涼錄』, p. 3306.

(108) 『晉書』卷 86 「張軌傳」, p. 2226.

(109) 『御覽』卷 758 「器物部三・餅」引『前涼錄』, p. 3365. 『屠項春秋』卷 70 「前涼錄一・張軌」(p. 892) 作“金胡餅”，並將『晉書』『御覽』兩條記事合在了一起。『春秋輯補』卷 67 「前涼錄一・張軌」(p. 486) 雖然也合記兩事，但仍從『御覽』作“金胡餅”。從“並人高”來看，應以“金胡餅”為確。關於金胡餅及銀胡餅的考證，參羅豐 2000.

最後，對於前涼王國，索氏的忠心還表現在對涼主的規勸進諫上，如在張駿時，理曹郎中索詢諫止東伐前趙，張駿說：“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參軍索孚勸諫勿治石田，卻被出為伊吾都尉。⁽¹¹⁰⁾ 又如張重華時，索遐先後三次進諫，一為行蒐狩之禮，二是舉薦謝艾，擊破後趙，三是勸主動政；徵事索振也同樣勸諫張重華勤政尚儉。⁽¹¹¹⁾ 前涼末年，張“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但答而未從。⁽¹¹²⁾ 索氏對前涼國主不斷進諫，規勸得失，可謂竭力輔佐，忠心耿耿；然而越到後來，前涼政衰，已聽不進去這些忠言了，以致走向亡國。

令狐氏的勢力雖然比氾·索二氏稍遜，但據統計也有 11 人之多。『新唐書』卷 75 下「宰相世系表五下」“令狐氏”條云：

溥五世孫晉諫議大夫馨，馨孫亞，字就胤，前涼西海太守·安人亭侯。二子：理·綏。亞孫敏，字永昌，前涼鳴沙令。四子：達·忠·襲·越。敏五世孫虬，字惠獻，後魏敦煌郡太守·鶻陰縣子。

據 S. 1889 「敦煌氾氏家傳並序」記載，漢末令狐溥不僅與張奐友善，稱賞氾孚的學問人品，而且還給氾咸教授經緯之學；敦煌郡別駕令狐富又給汜緒教授『春秋』『尚書』。到西晉時，令狐豐·令狐宏兄弟一度被以宋質為首的本地大族推舉為敦煌太守。⁽¹¹³⁾ 孫曉林對漢至十六國敦煌令狐氏進行了系統考察，認為從漢末至西晉已成為以經學傳家的高門世族，五涼時期 “令狐氏家族在政治舞臺上時隱時顯，顯時則同時數人俱顯，隱時則了無痕跡，給人以整個家族共進退之感。在隱顯之間，似乎令狐氏有選擇地與漢族政權取積極合作的態度。這背後也許是以儒學經術傳家的文化底蘊在起著某種作用”。⁽¹¹⁴⁾

(110) 『晉書』卷 86 「張軌附張駿傳」, p. 2235.

(111) 『魏書』卷 99 「私署涼州牧張寔附張駿傳」, pp. 2194-2195.

(112) 『晉書』卷 86 「張軌附張重華傳」, pp. 2241-2245.

(113) 『晉書』卷 86 「張軌附張天錫傳」, p. 2250.

(114) 『通鑑』卷 79, p. 2523 ; 『晉書』卷 3 「武帝紀」, p. 66 ; 『全晉文』卷 146 闕名「晉護羌校尉彭祈碑」, p. 2306.

(115) 孫曉林 1996.

前涼初年，令狐亞先任太府主簿，經常作為使者東西出使，如 305 年張軌平定秦州之亂，“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隨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從而為張軌割據河隴爭取到了正統合法性；又如 308 年張鎮·張越兄弟叛亂，張軌又“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告誡他“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¹¹⁶⁾ 張鎮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從而達到了分化張鎮兄弟與孤立張越的目的，為前涼王國的穩定又立一功。尤其是令狐·張二氏同出敦煌，兩家結為姻親，作為敦煌大族的令狐亞站在了前涼張軌一邊，既從內部分化了敦煌大族，同時又穩定了其他敦煌大族的心理。這位出色的外交人才後來昇任西海太守，其孫令狐敏為鳴沙縣令，回到本地做官。張軌執政時，還有一位治中令狐濶，曾奉命討平反叛的金城太守胡勗；又曾勸說悉徙西平麴儒集團，未獲同意，後來果致復叛，⁽¹¹⁷⁾ 可見他是一位具有豐富政治與軍事經驗的官吏。在《晉書》卷 95「藝術·索紹傳」中，記載到一位年屆耄耋的孝廉令狐策，為敦煌太守田豹與鄉人張公徵的子女婚姻做媒，體現了他作為地方耆老的身份。⁽¹¹⁸⁾

總之，氾·索·令狐三氏是漢代以來傳統的儒家高門世族，有著共同的儒宦背景與家族交往，在服務地方政權時亦能獲得較為平穩的發展。這一點與陰·宋二氏等前涼新貴截然不同，後者是晉涼之際新崛起的武力強宗，一直到前涼後期纔積累較高的儒家文化素養，故在政治鬥爭中的沉浮波動也比較大。

順便提一下，敦煌的其他姓氏也湧現出一些頗受矚目的人物，既有忠義節烈之士（如車濟），又有名將（如謝艾·常據）與學者（如郭瑀），還有寵臣小人（如劉肅），可謂良莠相雜。儘管這些姓氏中的個別人物頭角崢嶸，但其家族卻未得到全面的發展。因本文主旨是討論敦煌大族，故對這些小姓不作多論。

(116) 《晉書》卷 86「張軌傳」, pp. 2222-2224.

(117) 《御覽》卷 935「鱗介部七·魚上」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 p. 4154.

(118) 《晉書》卷 86「張軌傳」, p. 2226.

(119) 《晉書》卷 87「涼武昭王李玄盛附李歆傳」(p. 2270) 記載西涼末年，“敦煌父老令狐熾”託夢預言西涼將亡，也是令狐氏作為地方耆老的例證。

8. 從安定張氏的婚姻圈看前涼王國與河隴大族的關係

儘管敦煌大族在河隴大族中獨樹一幟，對前涼王國的政治支持亦極重要，但前涼國主安定張氏卻很少與敦煌大族進行聯姻，是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下面根據史料所載，將可考知的安定張氏的婚姻關係列作下表：

人名	配偶	配偶身份	郡望或里貫	出處	備注
張溫	辛氏		隴西	『御覽』卷 124	張軌父母
張寔	賈氏		武威	『晉書』卷 86	
張軌女	唐熙	晉太常丞	丹陽	『新唐書』卷 74 下	
張駿	嚴氏			『通鑑』卷 97	張重華嫡母
	馬氏	昭儀		『屠項春秋』卷 75	張重華生母
	劉氏	美人		『通鑑』卷 101	張天錫母
	妹好 *1	美人	鄯善	『何鏗春秋』卷 7	鄯善王元禮之女
張重華	裴氏	妃		『通鑑』卷 99	
	郭氏	夫人		『御覽』卷 124	張玄靖母
張祚	辛氏	皇后		『春秋輯補』卷 72	一作叱千氏 *2
張天錫	焦氏	左夫人		『晉書』卷 86	張大豫母
	閻氏	美人		『何鏗春秋』卷 7	
	薛氏	美人		『何鏗春秋』卷 7	
張氏女	宋澄	領軍將軍 *3	敦煌	『還冤記』	

*1 『屠項春秋』卷 72「前涼錄三·張駿」(p. 905) 則作“妹好”，『御覽』卷 124「偏霸部八·前涼張駿」(p. 600) 又作“殊好”。

*2 『春秋纂錄』, p. 145. 『屠項春秋』卷 73「前涼錄四·張祚」(p. 913) 則記作兩人：“立妻辛氏為王后，又立妻叱干氏為王后”。

*3 『通鑑』卷 101, p. 3185.

上表中前涼安定張氏配偶者的郡望或里貫，史載明確的僅張溫妻隴西辛氏·張寔妻武威賈氏·張駿美人鄯善妹好，以及張氏之婿丹陽唐熙·敦煌宋澄共五例；其他諸姓則難以遽斷，但顯然大多與敦煌無關。

張溫與隴西辛氏聯姻，自然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隴右地區的大族。前涼時期，安定張氏與隴西辛氏之間通婚較多，關係密切。“辛紳弟理，美姿貌，張駿欲奪

其妻，以寡妹妻之”，也是想與隴西辛氏結親，但辛理不願棄妻另娶，割鼻自誓，張駿大怒，“徙理敦煌，遂以憂死”；⁽¹²⁰⁾張祚時，“立妻辛氏為皇后”。⁽¹²¹⁾在前涼王國中，辛氏家族人物眾多，如作為西晉使節而留仕前涼的大鴻臚辛攀·敦煌太守辛憑·武興太守辛岩·廣武太守辛章·姑臧令辛岩·枹罕護軍辛晏，以及辛韜·辛掘·辛髦等，在地方及軍界很有勢力。⁽¹²²⁾

前涼張氏與武威賈氏的婚姻，已見前述，這是隴右大族與河西大族之間的政治聯姻。賈氏自東漢賈龔徙居武威後，逐漸發展成為本地著姓，子賈詡為曹魏名臣，西晉賈胤·賈龜·賈疋等皆位至大官，是漢晉時期河西地區舉足輕重的世家大族。⁽¹²³⁾前涼初期張軌與武威賈氏結為姻親，取得其政治支持，是穩定前涼統治的重要策略；但到張茂時誅殺賈摹，張·賈之間的姻親關係至此中斷，也加深了隴右·河西大族之間的矛盾，使前涼王國的統治基礎遭到削弱。

張軌在為子娶妻賈氏的同時，還嫁女給唐氏，這同樣是一種政治聯姻，祇不過親家是外來大族。唐氏祖上與河西也曾有過關聯，如東漢時唐惠任武威長，但其四世孫唐翔為丹陽太守，從此居住在江南；西晉時唐彬出任鎮西校尉，與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張軌同仕西北，地位相當，這一婚姻自然也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其子唐熙，官任“太常丞，娶涼州刺史張軌女，永嘉末，遂居涼州。生輝，字子產，仕前涼陵江將軍，徙居晉昌”。⁽¹²⁴⁾儘管在此前的魏初，敦煌可能就已有唐姓人存在，但張軌之婿唐熙卻屬於外來大族，該家族後來在晉昌冥安形成了很大的勢力，北涼段業時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聯合敦煌大族擁戴李暠建立了西涼王國。

(120) 『御覽』卷 379「人事部二十·美丈夫上」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p. 1751.

(121) 『晉書』卷 86「張軌附張祚傳」，p. 2246.

(122) 杜斗城 1985 對漢唐間的隴西辛氏作了系統考述，但對前涼辛氏祇擲出辛攀·辛憑·辛理及張祚辛皇后四人。

(123) 參李俊恒 2008.

(124) 『新唐書』卷 74 下「宰相世系表四下」“唐氏”條，p. 3202.

(125) 『三國志』卷 13「魏書·王朗附王肅傳」(p. 420)云：“魏初徵士敦煌周生烈，……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儘管注文稱“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但『姓氏書』卷 19「十八尤下」「周生」條則引劉炳（炳）『敦煌實錄』云：“周生烈，本姓唐，外養周氏”，p. 252.

前涼安定張氏與敦煌大族之間的婚姻，僅見宋澄一例，此例不見於正史與『通鑑』，顏之推『還冤記』記載張玄靚時，張瓘（瓘）專權，宋混遣弟宋澄誅之，張瓘臨死前對宋澄說：

汝荷婚姻，而為反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¹²⁶⁾

『屠項春秋』曾輯錄此條。⁽¹²⁷⁾從“汝荷婚姻”一語可知，宋澄娶了安定張氏女為妻。宋混·宋澄兄弟討滅張祚與扶立張玄靚有功，成為前涼的輔政大臣。由於這層關係，宋澄與前涼張氏締結政治聯姻自然可以理解。但359年右司馬張邕惡其專權，殺掉宋澄，使宋氏家族幾乎遭到滅門之災。宋繇之父宋奈就在這次事變中被誅，『魏書』卷52「宋繇傳」載其“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傳文還記載到他的妹夫張彥，可見宋繇之伯父與妹妹皆和張氏相通婚，但這裏的張氏應為敦煌大族，而非前涼安定張氏。因此從總體來看，敦煌大族雖與前涼王國關係密切，但卻與前涼安定張氏極少聯姻，宋澄僅為孤例，甚至可以說是宋氏專權時的一個特例。

從上表看，前涼安定張氏的其他婚姻對象，還有嚴·馬·劉·裴·郭·焦·閻·薛等氏，郡望或里貫不明，大多與敦煌無關。即若馬·劉·郭三氏可能出自敦煌，⁽¹²⁸⁾

(126) 『還冤記』，p. 3372.

(127) 『屠項春秋』卷75「前涼錄六·張瓘」，p. 925.

(128) 馬氏的情況比較複雜，有學者認為出自敦煌，如馬雍 1972 (p. 51) 說“宋·馬·索三家都是高昌的大姓，其原籍均出自敦煌”；王素 1993 (p. 64) 說“宋·馬·索三姓在河西基本上都祇有敦煌一個郡望”。但李鼎文在校點『續敦煌實錄』時，曾清理出6個非敦煌籍人，其中有“馬飭·馬岌，籍貫不詳。……整理時都刪去了”，參『續敦煌實錄』“校點說明”，p. 5。也有學者稱作酒泉馬氏，如洪濤 1992, p. 20。在河隴地區，馬氏還有出自“中州之令族”的馬輔（『晉書』卷126「禿髮傉檀載記」，p. 3149），盧水胡人馬權（『屠項春秋』卷97「北涼錄四·馬權」，p. 1085）。劉·郭二氏可能出自敦煌，如前涼時的劉肅·郭瑀。但是，即使像時代稍後的劉寶·劉炳父子，也都算不上是敦煌的大族；至於郭氏，『晉書』卷126「禿髮烏孤載記」(p. 3143)“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有來自西州·中州兩方的郭氏，如郭瑀為敦煌人，與郭倖可謂同屬“西州之德望”；而推立李暠的敦煌護軍郭謙卻是馮翊人，與郭韶一樣同為“中州之才令”。所謂“西州之德望”，“西州”是否指敦煌尚可討論，而“德望”也未必一定是大族。

但也祇是小姓，而與大族無關；裴·閻·薛三氏通常被認為是河東地區的大族，但遷徙到河隴者也祇能算是小姓；嚴·焦二氏非大姓，故不多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知，前涼安定張氏雖然和隴右·河西的大族進行通婚，但以隴右辛氏居多且關係密切，這可能是張·辛同為隴右大姓有關；河西大族武威賈氏·敦煌宋氏雖有姻親，但其性質為政治聯姻，且賈摹·宋澄皆遭張氏誅戮，婚姻關係並不鞏固；而與前涼張氏通婚更多的則是其他小姓。這種狀況在中古時期大族社會的背景下，無疑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9. 結語

自從漢武帝開拓河西以來，敦煌作為中原王朝控轄西域·隔斷羌胡的重鎮，又是絲綢之路中西交通的要衝，地位獨特而重要。到東漢時，敦煌成為“華戎所交，一都會也”，⁽¹²⁹⁾“東漢政府在敦煌有特殊的建置，同時，還擴大了敦煌太守的職權”，⁽¹³⁰⁾使敦煌郡成為轄理西域的重要基地。這一情況，直到魏晉仍無改變。進入前涼，⁽¹³¹⁾327年首次在西域地區設置了高昌郡，⁽¹³²⁾隸屬於新立的沙州，⁽¹³³⁾更加提升了敦煌的地位，擴大了影響，成為與涼州·河州鼎足而峙的重鎮。從漢至晉，敦煌的人口增幅在河西四郡中比例最高，到西晉時甚至連人口數字也居於四郡之首。⁽¹³⁴⁾以“敦煌五龍”為代表的學術文化水準，足以抗衡中原，領袖全國。五涼時期，以敦煌大族為核心的河西儒學可謂獨樹一幟。⁽¹³⁵⁾武守志云：“具有自己特色的河西儒學，其

(129) 司馬彪『續漢書』23「郡國志五」“敦煌郡”條劉昭注補引『耆舊記』，收入『後漢書』，p. 3521。

(130) 劉光華 1987, p. 31.

(131) 『晉書』卷14「地理志上」(p. 433)云：“魏時復分以為涼州，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至晉不改”。敦煌是涼州最西部的一個郡，對西域的轄理具體仍由其實際負責。

(132) 『初學記』卷8「州郡部」“隴右道第六”條注引『地輿志』曰：“晉咸和二年（327）置高昌郡”，上冊，p. 181。參山口洋 1995。

(133) 『魏書』卷99「私署涼州牧張寔附張駿傳」云：“敦煌·晉昌·高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p. 2195。又參『晉書』卷14「地理志上」，p. 434。

(134) 這祇需要對比『漢書』卷28下「地理志下」(pp. 1612-1614)與『續漢書』23「郡國志五」(收入『後漢書』，pp. 3520-3521)·『晉書』卷14「地理志上」(pp. 433-434)所載河西四郡的戶口數字，即可知道。

(135) 參『讀通鑑論』卷15「宋文帝」“十三”條，pp. 429-430。

運行的螺旋式圓圈是圍繞著敦煌儒士旋轉的”，“敦煌儒士不僅在數量上佔了絕對優勢，而且在學術成就上也居於遙遙領先的地位”⁽¹³⁶⁾。敦煌大族經過漢晉的孕育，到前涼時因中原大亂而效力於本邦政權，必然與前涼王國發生重要而密切的關係。

無論在史傳的記載裏，或者是在今人的著述中，滿眼都看到前涼王國中敦煌大族的影子在晃動，學者們也大多異口同聲地肯定敦煌大族的作用。然而，對於前涼王國來說，敦煌大族實際上並非鐵板一塊，而是一柄“雙刃劍”，他們中的大多數支持前涼政權，但也出現了前涼初期敦煌張·曹二氏圖謀奪取涼州最高統治權的現象。敦煌宋氏作為晉涼之際崛起的新貴，在前涼後期一度掌政，最終卻慘遭安定張氏的夷滅；武威陰氏勢力極盛，也受到張駿的誅戮打擊，之後西徙敦煌。宋·陰二氏是前涼軍界的實力派，缺乏儒宦根基，政治浮沉很大，家族起落懸殊，但在前涼後期他們逐漸從武力強宗向儒家世族轉變。家族自身發展最穩固，且給前涼王國提供最穩定支持的，則是敦煌地區漢代以來的傳統老牌大族氾·索·令狐三氏，他們以經學傳家，靠通經致仕，體現了以儒宦為根基的成熟穩定的高門世族的特徵。我們發現，前涼王國對於宗族勢力強大，文化水準極高的敦煌大族，也存在著兩方面的心理矛盾，既有團結拉攏，以獲取他們對政權的支持；卻又極少與之通婚，沒有形成中古時期極富特色的婚宦網絡，是個耐人尋味的特殊現象。這也從一個侧面反映出前涼王國統治基礎中的致命弱點。因此，對於敦煌大族與前涼王國的關係，必須具體分析，而不是籠統視之。

(136) 武守志 1987, pp. 5-6.

略号

P. =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P. PELLION 所獲敦煌文獻

S. =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 A. STEIN 所獲敦煌文獻

BSOA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正史（『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魏書』『北齊書』『隋書』『北史』『新唐書』）
= 北京，中華書局，1959-1975。

『通鑑』=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讀通鑑論』= 王夫之『讀通鑑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

『初學記』= 徐堅等（輯）『初學記』（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御覽』= 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何鏗春秋』= 崔鴻（撰），何鏗（輯）『十六國春秋』，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載記類」
(第 463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新 1 版，2003。

『屠項春秋』= 崔鴻（撰），屠喬孫・項琳（輯）『十六國春秋』，文淵閣『四庫全書』
「史部載記類」(第 463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新 1 版，2003。

『春秋纂錄』= 崔鴻（撰），湯球（輯）『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附校勘記）』（『叢書集成初編』3820）北京，中華書局，新 1 版，1985。

『春秋輯補』= 崔鴻（撰），湯球（輯）『十六國春秋輯補』（『叢書集成初編』3816-
3819）北京，中華書局，新 1 版，1985。

『王隱晉書』= 王隱（撰），湯球（輯）『晉書』（『叢書集成初編』3806-3810 所收
『九家晉書輯本』）北京，中華書局，新 1 版，1985。

『姓纂』= 林寶『元和姓纂』（全 4 冊）南京，金陵書局，1880。

『姓氏書』=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正』（『叢書集成初編』3297-3304）北京，中華書局，
新 1 版，1985。

『書斷』= 張懷瓘『書斷』（『叢書集成初編』1626-1627 所收張彥遠（集）『法書要錄』
卷 9）北京，中華書局，新 1 版，1985。

『還冤記』= 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之『說郛一百二十卷』卷 72（第 6 冊）所收
顏之推『還冤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全晉文』=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所收『全晉文』北京，
中華書局，1958。

『英藏敦煌』=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
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沙知（主編）『英藏敦煌文
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 3 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法藏敦煌』=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1,
16, 3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001, 2005。

『續敦煌實錄』= 張澍（輯），李鼎文（校點）『續敦煌實錄』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5。

『涼州府志』= 張澍（輯錄），周鵬飛・段憲文（點校）『涼州府志備考』西安，三秦出版社，
1988。

- 『重修敦煌縣志』 = 呂鍾（修纂）『重修敦煌縣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 『敦煌志』 = 『敦煌志』編纂委員會（編）『敦煌志』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敦煌學大辭典』 =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 『樓蘭集成』 = 侯燦・楊代欣（編著）『樓蘭漢文簡紙文書集成』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
- 『墓誌彙編』 = 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參考文獻

BOLTZ, William

- 1996 "Notes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o tan 索統 Manuscript of the *Lao-tzu* 老子 ." In: *BSOAS*, vol. LIX-3, pp.508-515.

陳長琦 & 周羣

- 2005 「『十六國春秋』散佚考略」『學術研究』7, pp. 95-100.

陳琪

- 2007 「敦煌張氏書法人物輯考」『敦煌學輯刊』2, pp. 114-120.

杜斗城

- 1985 「漢唐世族隴西辛氏試探」『蘭州大學學報』1, pp. 82-88.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組

- 1974 「敦煌晉墓」『考古』3, pp. 191-199.

馮培紅

- 2001 「敦煌曹氏族屬與曹氏歸義軍政權」『歷史研究』1, pp. 73-86.

- 2005 「漢晉敦煌大族略論」『敦煌學輯刊』2, pp. 100-116.

後藤勝

- 1967 「河西王國の性格について」『歷史教育』15-9 / 10, pp. 29-35.

郭鋒

- 1995 「晉唐時期的譜牒修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 pp. 25-39.

HENNING, W. B.

- 1948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In: *BSOAS*, vol. XII-3 / 4, 1948, pp. 601-615.

洪濤

- 1992 『五涼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池田溫

- 1962 「敦煌氾氏家傳殘卷について」『東方學』24, pp. 14-29.

- 1965 「唐朝氏族志の一考察——いわゆる敦煌名族志残卷をめぐって——」『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紀要』13-2, pp. 3-64.

- 1990 『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姜伯勤

- 2002 「高昌世族制度的衰落與社會變遷——吐魯番出土高昌麴氏王朝考古資料的綜合研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4, 北京, 商務印書館, pp. 39-56.

小山滿

- 1972 「『張濟』文書の一考察」『東洋學術研究』11-1, pp. 118-135.

李聚寶

- 1987 「十六國時期敦煌的政治狀況」『蘭州學刊』3, pp. 80-86.

李俊恒

- 2008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武威賈氏」『史學月刊』7, pp. 125-128.

劉光華

- 1987 「論東漢敦煌在中原與西域關係中之重要地位」敦煌文物研究所（編）『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上冊）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 pp. 27-44.

羅豐

- 2000 「北周李賢墓出土的中亞風格鎏金銀餅——以巴克特里亞金屬製品為中心」『考古學報』3, pp. 311-330.

馬德

- 1997 「敦煌陰氏與莫高窟陰家窟」『敦煌學輯刊』1, pp. 90-95.

馬雍

- 1972 「略談有關高昌史的幾件新出土文書」『考古』4, pp. 46-53, 63.

町田隆吉

- 2000 「『資治通鑑考異』所引『十六國春秋』及び『十六國春秋鈔』について——司馬光が利用した『十六國春秋』をめぐって——」『國際學レヴュー』12, pp. 33-54.

前田正名

- 1967 「五胡十六國と河西——前涼を中心として——」『歴史教育』15-5 / 6, pp. 26-34.

孟凡人

- 1995 『樓蘭鄯善簡牘年代學研究』烏魯木齊, 新疆人民出版社.

MOTE, Frederick

- 1986 "The Oldest Chinese Book at Princeton." In: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I-1, pp. 34-44.

齊陳駿

- 1981 「略論張軌和前涼張氏政權」『蘭州大學學報』3, pp. 59-70.

- 2005 『西北通史』（第2卷）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

邱久榮

- 1992 「『十六國春秋』之亡佚及其輯本」『中央民族大學學報』6, pp. 23-28.

饒宗頤

- 1955 「吳建衡二年索紇寫本〈道德經〉殘卷考證（兼論河上公本源流）」『東方文化』2-1, pp. 1-71.

佐藤智水

- 1980 「五胡十六国から南北朝時代」 榎一雄（責任編集）『講座敦煌』第2巻『敦煌の歴史』東京、大東出版社、pp. 39-98.

施光明

- 1991 「西州大姓敦煌宋氏研究」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編）『魏晉南北朝史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pp. 166-177.

白須淨真

- 1980 「在地豪族・名族社会—— 一～四世紀の河西 ——」 池田温（責任編集）『講座敦煌』第3巻『敦煌の社会』東京、大東出版社、pp. 3-49.

孫曉林

- 1996 「漢 —— 十六國敦煌令狐氏述略」『北京圖書館館刊』4、pp. 92-96, 24.

津田資久

- 2008 「符瑞『張掖郡玄石図』の出現と司馬懿の政治的立場」『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5、pp. 33-68.

王素

- 1985 「魏晉南朝火祆教鉤沉」『中華文史論叢』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p. 225-233.

- 1993 「吐魯番出土『某氏族譜』新探」『敦煌研究』1、pp. 60-68.

王仲瑩

- 2007 「『敦煌氾氏人物傳』考釋」同氏『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p. 177-183.

武守志

- 1985 「五涼政權與西州大姓」『西北師範大學報』4、pp. 25-31.

- 1987 「五涼時期的河西儒學」『西北史地』2、pp. 1-10.

山口洋

- 1995 「高昌郡設置年代考」小田義久先生還暦記念事業会（編集）、谷川道雄（代表）『小田義久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集』京都、真陽社、pp. 29-50.

嚴耕望

- 1997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歴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五B）臺北、中央研究院歴史語言研究所、影印4版.

楊學勇

- 2004 「敦煌陰氏族源與郡望」『尋根』4、pp. 96-100.

趙儻生

- 1986 「『十六國春秋』『晉書・載記』對讀記」『史學史研究』3、pp. 7-12.

趙向羣

- 1989 「河西著姓社會探赜」『西北師範大學報』5、pp. 74-80.

- 1996 「五涼史探」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趙以武

- 1993 「武威陰氏與陰鏗」党壽山（主編）『五涼文化研究』（創刊號）武威、pp. 11-17, 33.

鄭炳林

1992 『敦煌碑銘贊輯釋』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周一良

1997 「魏收之史學」同氏『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pp. 256-292.

(初刊：『燕京學報』18)

【補記】本文初稿撰寫於 2007 年 6-9 月在大阪大學東洋史研究室從事博士後工作期間，9 月 27 日歸國前夕承蒙森安孝夫教授約稿，回國後進一步修改完稿。高啟安·楊富學·陳麗萍·張善慶·董華鋒·王慶昱在資料上給予了幫助。恩師齊陳駿教授及王丁·李軍通讀了全文並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意見，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 2008 級博·碩士研究生及留學生山本孝子在課堂上一起討論了本文，幫助指出了若干錯字。本文得到中國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漢宋間敦煌大族研究”(041201) 的資助。在此對以上師友同學一併深致謝忱。